

名人·历史瞬间



张焕宗

著

唐绍仪

与清末民国政府

-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朝元老；
- △中华民国建国功臣、民国政府首任内阁总理；
- △他几度沉浮……
- △他的死至今是个未解之谜。

河北人民出版社

名人·历史瞬间

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

张焕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名人·历史瞬间
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

张焕宗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156,400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3.00元

ISBN 7-202-02290-7/K·578



南北议和时期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



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内阁总理唐绍仪

前 言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为了开展洋务事业和培养外交人员的客观需要，开始陆续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漂洋过海，学有所长的留学生归国之后，大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唐绍仪便是1874年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7年留学生活对他进步思想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都很大。他回国步入政界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危机四伏，列强环伺，政局动荡，风云变幻的复杂历史时期；置身于从清末至民国的不同的政府之中，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在晚清政府中，唐绍仪由一个品位低微的幕僚，逐渐升迁至朝廷的封疆大吏；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由封建王朝的一品大员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建国功臣和民国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尔后，其沉浮起落，进取消极，曲折迂回不仅为近代人物所少见，及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又再度名声大噪，但随即便在沦陷于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死于非命。死后仍被当时的中日交战双方紧紧抓住各作文章，并形成了长期以来的一件历史疑案。

本书力求提供给广大读者的便是唐绍仪这一经历复杂，交游

广泛而又极具特殊色彩的历史人物，在从清末至民国的不同政府中所从事的政治、外交等活动，以及他在这些政府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目 录

前 言	(1)
一 清末政府对外交涉重臣	
1. 随驻朝鲜崭露头角	(1)
2. 二度附袁再展才华	(17)
3. 对英谈判力捍主权	(25)
4. 力图收回路关权益	(35)
5. 坐镇奉天抵制日本	(51)
6. 出使日美欧洲诸国	(61)
二 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1. 辛亥南北议和代表北方	(75)
2. 出任总理与袁冲突下野	(95)
3. 反袁称帝投身护国运动	(117)
4. 竭力护法代表南方谈判	(137)
5. 支持“联治”与孙分道扬镳	(148)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小县长	
1. 甘愿屈就中山模范县长	(159)
2. 力促中山全县百业俱兴	(164)
3. 开辟中山港的宏伟计划	(168)

4. 与“南天王”摩擦而遭驱赶	(172)
四 国民政府与日争夺对象	
1. 卷入日寇“南唐北吴”计划	(178)
2. 备受南迁国民政府关注	(183)
3. 热衷于谈判但拒做傀儡	(186)
4. 悲剧性结局府邸遭刺杀	(189)
后 记	(205)

一 清末政府对外交涉重臣

唐绍仪从 1881 年美国留学归来，到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的 30 年内，一直在晚清政府为官。他由一个品级低微的一般涉外官吏，迁升侍郎、尚书、以至封疆大吏和对外交涉大臣，升迁速度颇快。其中，机遇固然不可缺少，但他自己也确具出类拔萃的学识、胆略及才干。

1. 随驻朝鲜崭露头角

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始于 1393 年（明洪武二十六年），止于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历时 500 余载。其间，每当朝鲜新王即位，即由中国皇帝谥号前王，册封新王。朝鲜奉中国为正朔，定期纳贡，并于节庆日期遣使祝贺。朝鲜对中国的这种“以小事大”的封建宗藩关系，到唐绍仪被派赴朝，开始他政治生涯之时，仍然没有改变。

不过，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大清帝国自身已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遂使日本势力乘机侵入朝鲜，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便日趋恶化。1882 年 7 月，汉城士兵因不满日本的侵略和本国政府的扣发军饷而举行了起义，史称“壬午兵变”。兵变发生后，朝鲜政府立即向宗主国清政府发出了请兵弹压的要求。清

政府从巩固中朝宗藩关系和防止日本借事要挟出发，决定出兵，并于同年8月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淮军统领吴长庆、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袁世凯等率军舰3艘、士兵3000名入朝，镇压了这次起义。此后，清军便留驻朝鲜，帮助朝鲜政府整顿，训练军队。

1884年4月，法国将侵略的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境，清政府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加强边防。李鸿章立即奏调吴长庆带兵3营离朝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命袁世凯总理留朝的3营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这一年确是多事之秋，朝鲜的政局也并不稳定。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日本以“壬午兵变”中使馆被焚，日本人被杀为借口，迫使朝鲜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即《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依据这两个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朝鲜的大量赔款和增开通商口岸，还可以在朝鲜驻屯军队，日本外交官及其家属也可以在朝鲜自由旅行等等。这样日本的势力便得以进一步向朝鲜渗透。另一方面，朝鲜政府内部，由金玉均等青年官僚组成的开化党，正在加强与日本勾结，准备发动政变，脱离中国而“自主”。一场新的变乱正在酝酿之中，而朝鲜政府和驻朝清军对此并未察觉。

同年12月4日，金玉均等在日本配合下发动了政变。他们进入王宫，控制了国王李熙，矫诏处死了倾向中国的大臣，并改组了政府。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甲申政变”。袁世凯于夜间获悉政变的消息后大吃一惊，立即电告李鸿章，同时，也率兵出动，准备镇压。途中，他听说亲华的朝鲜大臣闵泳翊在政变中受伤未死，逃出后已被家人送到税务司穆麟德（德国人）宅中救治。为了进一步了解政变的情况，他率兵先奔穆宅。在穆宅门前微弱的灯光下，他看到了一个身材伟岸的青年。此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见他带兵骤至，立即上前盘问。后经交谈，才知都是自己人。原来此人名叫唐绍仪，是清政府派到朝鲜的帮办税务委员。

唐绍仪，字少川，是广东香山人氏。他的童年时代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提倡洋务运动以自强之时。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唐绍仪是1874年随清廷所派第三批留学生赴美留学的，当时他年仅14岁。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度过了7年的学习时光，最后在耶鲁大学文科毕业。7年的海外留学不算短暂，对他思想的形成及他的政治生涯的影响都相当大。1881年，他奉召回国后，先被安排在天津水师继续学习，转年，李鸿章推荐前驻天津的德国领事穆麟德去朝鲜襄助海关事务，他便被荐担任穆麟德的秘书，随同赴朝，帮设海关。

“甲申政变”发生后，闵泳翊身带剑伤逃到穆宅避难。唐绍仪适时正在穆宅，他惟恐开化党人尾随追杀灭口，便主动持枪到门外护卫。这就表现了唐绍仪具有在政治斗争中所必须具备的机智和勇敢。袁世凯对唐绍仪这一极不寻常的表现，钦佩不已，他感到唐绍仪这个青年，可是个智勇兼备的难得人才。

袁世凯了解了政变的经过后，意识到事态已相当严重，如让亲日的开化党人掌握了政权，朝鲜必然会脱离中国，依附日本；他自己准备在朝鲜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志向和愿望，也将随之而破灭。既然前景是如此的灰暗，倒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主意拿定后，袁世凯立即率领大队清军和他训练的两营朝鲜亲军向王宫奔去。支持政变的日军见大队清兵赶到，急忙开枪射击，袁世凯也下令清军还击，双方展开了枪战。激战一阵后，日军因人数较少支持不住，日本公使竹添只好率日军撤离王宫，随后又自焚了使馆，与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乘船逃往仁川。朝鲜王李熙在袁世凯的拥护下，下诏重组了政府，恢复了原来的秩序。短命的“甲申政变”便至此终结。

显而易见，代表清政府的袁世凯成了这次事变中的胜利者。他

本想抓住这个时机，加紧控制朝鲜，使自己在仕途上再高升一步，然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和乐观。日本公使竹添兵败回国之后，不仅推卸自己的罪责，还诬蔑清政府和朝鲜人民如何仇恨日本。于是，原本想借开化党政变驱逐清朝势力，扶植自己势力，以扩大对朝鲜侵略的日本政府，就势利用了竹添的报告，大肆进行歪曲宣传，煽动日本朝野的反清情绪。结果，有的政府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对清廷宣战，一些团体也在上野公园举行“膺惩清国大会”，有的团体甚至还组织义勇军，要求日本与法国联合进攻中国。反清气焰一时甚嚣尘上。同时，日本政府还将罪责转嫁给朝鲜政府，并派遣日军侵入汉城，又以使馆被焚、日本人被杀等借口，迫使朝鲜政府签订有道歉、赔款、惩凶、重建日本使馆和兵营等内容的《汉城条约》，达到了扩大侵略朝鲜的目的。由于这个《汉城条约》并未解决中日军队的冲突问题，日本政府又扬言还要同中国进行谈判，要求清军退出朝鲜。

1885年3月，日本伊藤博文一行来华解决中日军队在朝鲜的冲突和撤兵问题。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谈判。4月，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均不派员训练朝鲜军队；今后朝鲜如有变乱重大事件，派兵去朝要互相照会，事定即撤，不再留防。伊藤还提出要惩办袁世凯，李鸿章坚决不接受，最后为了敷衍日本人，李鸿章答应以私人名义警告责备袁世凯。

当日本扬言要清军撤出朝鲜之时，袁世凯也感到了事态发展的不妙，愤慨之余即以养母有病为名，请假回国。《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去朝鲜了，便心灰意懒地在家闲住起来。但是，他没有料到就在这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形势又发生极富戏剧性的转变。

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

朝鲜公使韦贝不断进行活动，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府在不长的时间内经历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已成惊弓之鸟，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利益冲突的加剧深感焦虑不安，惟恐中日决裂危及朝鲜。在税务司穆麟德的策划下，便有暗结北方的俄国为后援之意，并与俄国订立了“第一次俄韩密约”。朝鲜政府这种“联俄拒清”政策，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为了维护中朝的宗藩关系，李鸿章决定起用熟悉朝鲜事务的袁世凯，准备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担任驻朝鲜商务委员。为了使袁世凯到朝鲜后，不仅仅单纯照料商务，还能从政治外交等方面控制朝鲜政府。李鸿章还向朝廷建议提高袁世凯的权限。于是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最后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1月13日，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再赴朝鲜上任，在汉城设立了公署，还特别挑选了原在穆麟德属下工作的唐绍仪做他的随员和西文翻译。由此这两个教养和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开始了他们政治上的合作，他们不久在私人关系上又义结金兰之好，拜了把兄弟。

唐绍仪从大洋彼岸学成归国，面临的仍然是一个讲究家族名望与传统功名，惟科举是正途的封建时代，留洋资历在当时还不是仕途高升的有利资本。但是，他于偶然中结识了袁世凯并受到袁的赏识，而他自己又具备精明的头脑和出色的才干，于是任职朝鲜便成了他政治上崭露头角的重要阶段。他随同袁世凯上任后很快成了袁世凯把持朝鲜局势，维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得力助手。当袁需要与西方国家驻朝使节及各界人士进行交涉时，他也都给予了有效的合作。

“甲申政变”失败后，亲日的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逃亡日本，于1885年秋想通过日本旧自由党的政客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动员武装日本浪人侵入朝鲜，事前于大阪被揭发而失败。但此事不仅对朝鲜刺激很大，袁世凯也深恐金玉均与日本勾结不利

于清朝在朝鲜的宗主地位。因此全力支持朝鲜应付可能的变局，并策划暗杀金玉均。中朝双方约定各选派一个勇谋兼备者一同前往。中方人选很快确定，唐绍仪不畏艰险，勇于前往。袁世凯写给总署的报告说，唐绍仪娴习洋务，胆识俱优，慎密老成，能胜任这一派遣。后来这一密谋由于朝鲜方面难以物色到合适人选，未能成行。

1885年2月底，清政府获悉了英国为了与俄国抗衡将占领朝鲜巨文岛的传闻，但是李鸿章当时认为英国占据此岛是为了对付俄国，与朝鲜、中国没有什么损害，所以未予关注。同年4月15日，英国亚洲舰队突然占领巨文岛。由于巨文岛地处朝鲜海峡的门户，扼守俄国东洋舰队行驶的要道，俄国立即采取了反击措施，一方面向朝鲜政府声明英国的行动不能容忍，另一方面以它将占据朝鲜领土为威胁对中国施加压力。加上朝鲜政府也一再抗议英国侵占其领土，清政府才在外交上展开了劝英国撤出巨文岛的攻势。1886年春，唐绍仪也参与了这一涉及中朝俄英的交涉。最后俄国同意口头保证决不占领朝鲜领土，清政府将俄国的承诺转告了英国，英国便于1887年2月撤出巨文岛。

在巨文岛事件后，唐绍仪还在阻止韩俄结盟，阻止朴定阳使美等交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才能，维护了清政府对朝鲜的宗藩关系。因而深受袁世凯的倚重并成了袁的主要助手。1889年10月，袁世凯写报告上呈李鸿章，报告中称赞唐绍仪优有胆略，明敏谙练，要求李鸿章委任唐绍仪兼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汉城领事。从此唐绍仪便以袁世凯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同步晋升的机遇。

根据1882年清韩所定《中韩水陆通商章程》，中国所派商务委员前往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唐绍仪兼任龙山商务委员后，忠于职守，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处理了一件伤害华商

的积案。这一案件的大致情况是：寓居朝鲜的华商所开设的“三合兴”各商号的房屋财货，先后被人放火焚毁，这些商号的华人伙计也惨遭杀害，但此案很长时间一直未能破获，一些善后事宜也就耽搁下来。唐绍仪认为如此对待很不应该。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并上报总署（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一，朝鲜外署应限期严缉各案人犯，一定要拿获法办；第二，在未破案前，先行设法赔偿各商号被焚资本，酌量抚恤死者家属，以示体恤。很明显，唐绍仪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积极而妥善的。虽然他是上任伊始，但已显露出精明与干练。

1890年7月，汉城发生了一起韩商排挤华商的“撤栈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有背景的。根据清韩所订的《中韩水陆通商章程》，华商在韩可享受一些特权，如缴纳低于其他国家商人的关税，可自由在韩国各地从事商业活动等等。久而久之，首都汉城的经商权便为华商所垄断。朝鲜官商对此极为不满，便在背后唆使韩商闭市数日，企图挤迫华商迁往距汉城5公里的龙山，使华商不能再与韩商9厘分利。由于有韩王密令，韩商便无所顾忌，地方官也放任不管。唐绍仪对这一事件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写了上呈总署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对事件的原委做了极为明了透彻的分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后经总署对韩责斥，这一事件才获得解决。

1891年8月6日夜，龙山分署的巡差发现了一个未领执照的华工趁着朦胧夜色进入了俄国使馆。他便跟着前往查看，使馆人员加以阻止，双方为此发生了争执。事后俄国公使向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提出交涉，抗议华捕擅入俄国使馆查询华工。袁世凯因事出龙山，谕令唐绍仪查办。唐绍仪根据清韩所定《中韩水陆通商章程》中，凡来韩华民均须到分署领取执照，以便稽查以及无论在何处雇工，均须托取保人赴分署领取执照，违者查办

等条款，在给俄公使的复文中坚持原则，据理辩驳说：华捕查传未领执照之华工，系巡差应行之事，只是未携本府文件入使馆，有所不妥，已对其进行责斥，贵公使也应告诫该华工前来申领执照。俄国公使对唐绍仪这种软中带硬，转守为攻的复文十分不满，又提出了正式照会。照会中指责唐绍仪未先通知俄公使和获得允准，便派巡捕前来使馆传带华工的做法不仅违犯万国公法，也违反日常礼仪。进而还狂妄声称该华工应归俄使馆保护管辖，于其本国应行各事一概免除，其本国官员也无权干涉。就在俄公使气焰嚣张之时，唐绍仪于12日采取了强硬措施，押禁了依恃俄使馆袒护，对《章程》明知故犯的华工高阿成，同时函告俄国使馆。俄公使对唐绍仪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甚至不怕事态升级的断然措施，甚感意外，遂于13日再次照会说：要求立即释放该华工，否则后果自负。同时还以要将此案详报本国政府暨驻北京公使相威胁。唐绍仪丝毫不为俄公使的恐吓所动，坦然答复说：拘禁违犯令章的华工高阿成是无可非议的事，贵使欲如何对待和处置，完全是贵使自己的事，只是贵使干涉中国官员审办案件之权，有碍本署国体权利之事，我也不得不详请我国政府核办。事态至此，僵持不下。直至25日由于广帮怡泰号具保，唐绍仪便释放了高阿成，并为其补发了执照。事件到此应算了结，但俄公使觉得丢了面子，不肯就此罢休，便直接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并于11月7日派翻译官向唐绍仪提出“送文赔礼”的要求，而且送文内还要声明，已从严惩处了进入俄使馆的巡差和在市上拿获未领执照的华工违反了公法等等。唐绍仪坚持原则，据理驳辩说：惩戒巡差之事，我已按要求办了，并已面告公使。至于送文一事，未奉我政府命令，不便擅送。此外，再次重申：在市上拿获未领执照之华工，完全是身为中国理事官本人的应有之权利，没有任何违反公法之处。由于唐绍仪态度强硬、义正词严，俄公使无懈可击，难